

20世纪文化大师与学术流派丛书

胡适与胡门弟子

罗振亚 刘波 著

在中国现代史上，胡适是一个说不尽的人物，他的自由思想和宽容情怀至今仍在影响我们的社会。本书以胡适的成长经历、爱情婚姻、学术成就等为出发点，详述其作为一代大师的人格魅力与精神风范。胡适不仅自己在文史哲领域开风



气之先，更培养出一批传承其现代学术方法的得意弟子，并形成了一个独特流派。本书另一条主线，即试图挖掘胡适和其弟子的学术交往生态，还原弟子们之间恩怨纠葛的历史现场，呈现民国时代人文知识分子的理想主义精神，以让我们重新认识胡适一生为学为师的成败得失。

大家出版社

胡适

与胡门弟子

——



20世纪文化大师与学术流派丛书

胡适

与胡门弟子

罗振亚 刘波 著



大象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胡适与胡门弟子 / 罗振亚, 刘波著. — 郑州 : 大象出版社, 2014. 7

(20 世纪文化大师与学术流派丛书)

ISBN 978-7-5347-7443-0

I. ①胡… II. ①罗… ②刘… III. ①胡适
(1891~1962)—传记 IV. ①K825. 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18052 号

胡适与胡门弟子

罗振亚 刘 波 著

出 版 人 王刘纯
策划组稿 张前进
责任编辑 燕 楠
责任校对 毛 路 李婧慧
装帧设计 王莉娟

出版发行 大象出版社(郑州市开元路 16 号 邮政编码 450044)
发行科 0371-63863551 总编室 0371-65597936

网 址 www.daxiang.cn

印 刷 郑州文华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23.5

字 数 302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7 月第 1 版 201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8.00 元

若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印厂地址 郑州市金水区柳林镇马林工业园

邮政编码 450046 电话 0371-65642565

总
序

中国的 20 世纪是一个天翻地覆、波澜壮阔的世纪,在这个现代百年里,涌现出为数不少的改变历史和文化的伟人和大师,他们的出现不仅重塑了中国形象,而且对此后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文化信仰等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本丛书以“20 世纪文化大师与学术流派”为写作对象,力图以现代文化大师及其弟子们的文化、政治、学术活动为中心,梳理近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谱系,描绘现代中国的文化地图,在对历史的回顾中,理解现在,展望未来。

本丛书可以说是对以师徒关系为中心形成的现代知识群体的研究。中国文化素有“尊师重道”的传统,所谓“道”者,意指“终极真理”“一切的本原”,为师者担负着“传道、授业、解惑”的责任,其所担负的社会文化角色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故而“重道”也就意味着“尊师”。现代中国是一个革故鼎新的时代,旧的一切在时代浪潮的冲击下土崩瓦解、走向没落,而新的一切方兴未艾、势不可当。在此前所未有的巨大变革中,出现了一些为现代中国文化奠定基本格局的具有开创性的文化大师,他们的出现填补了传统退位后留下的精神信仰的空白,成为现代人仰慕、尊崇的导师、传统“圣人”一般的人物。这些大师级人物大都带有马克斯·韦伯

所谓的“克里斯马”(charisma)人物的神采和魅力。“克里斯马”一词,最初用来形容宗教领袖,意思是指具有特殊魅力和吸引力的人,后来泛指各类具有超凡魅力的领袖人物。马克斯·韦伯认为“克里斯马”人物以其表现出的某种超凡的品质,“高踞于一般人之上,被认为具有超自然、超人或至少是非常特殊的力量和能力”^①。“克里斯马”现象的出现在其时代也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机制的表现,无论是认为“英雄造时势”还是强调“时势造英雄”,“英雄”与“时势”的关系是极为密切、不可分割的,它彰显的是一种人与时代的互动:一方面“王纲解纽”的时代使这类创世精英脱颖而出,以天下兴亡为己任,锐意求变,率先垂范,成为得时代风气之先的先觉者、预言家和精神导师,吸引众人成为他的追随者;另一方面,新旧转型期的文化精神危机呼唤着这类人物的出现,以满足人们迫切的精神需求,使人们的心灵不因固有信仰的崩解而陷入空虚、迷茫,获得一种新的精神归宿感。处于由传统向现代转换之际的中国社会,出现了严重的政治、伦理、宗教、文化信仰的危机,人们对传统的价值观念和信仰体系发生根本动摇,社会亟须一种新的信仰,来重新凝聚散乱的人心,这就为“克里斯马”人物的出现提供了众多的受众和适宜的时代土壤。“克里斯马”人物的出现,可以为人们的心灵提供一种导向,进而转变人们的信仰和行为,使他们“以全新的观点去看待各种问题”,因此,“克里斯马”可以表现为一种变革时代的“强大的革命力量”。马克斯·韦伯认为人类社会迄今共有三种权威类型,它们分别是:传统的权威、“克里斯马”的权威和法理的权威。“克里斯马”权威是介于传统权威和现代法理权威之间的过渡期的文化现象。

本丛书所包括的文化大师——康有为、章太炎、胡适、鲁迅、周作人、钱穆等大都是在近现代文化学术上创宗立派、开一代风气、具有超凡魅力的领袖人物,其中康有为、章太炎两位是活跃于清末

^① 转引自汝信:《现代外国哲学》,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97页。

民初的政学两界的文化大师,对后世影响甚巨。康有为自幼期为圣贤,及长更是以“圣人”自居,不屑于词章考据之学,而专注于义理之学,养心静坐。他曾于“静坐时,忽见天地万物皆我一体,大放光明,自以为圣人,则欣喜而笑”^①,自谓进入了“得道成圣”之境。康有为融会中西,由现代“公同平等”原理,推演出世界“大同”之说,在其时代收到了一种石破天惊的破旧立新效果;他积极投身政治、倡导维新变法,并吸引众多弟子讲学论政,其中以梁启超、陈焕章、徐勤等最为著名,他们形成“康门弟子”这一晚清著名政治、文化门派,影响之大,自不待言。晚年的康有为成为现代中国的政治、文化保守主义的代表人物,在清末民初时代变局中也是一位自成一派、不可忽略的研究对象。章太炎则以清末“有学问的革命家”名标青史,他率先倡导民族革命,曾因“苏报案”入狱三年,出狱之后,革命之志更坚,流亡日本、宣传革命、聚众讲学,深得进步青年学子的敬仰,在他身边聚拢了不少杰出人才,其门下弟子钱玄同、周氏兄弟等成为了其后新文化运动的主力军,影响也不可谓之深远。章太炎的学问“以朴学立根基,以玄学致广大”,在现代思想史、学术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他具有一种“究元决疑”的思想家的气质,以《俱分进化论》《五无论》《四惑论》等名篇,对时代思潮、人生真谛等进行了深入的哲学思考和独特判断,留下了弥足珍贵的思想遗产。至于胡适,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锋,“文学革命”的倡导者。青年时代的胡适就是一位颇有使命感的人物,他在1916年4月12日,就填了《沁园春·誓诗》一词,其中写道:“文章革命何疑!且准备擎旗作健儿。要前空千古,下开百世,收他臭腐,还我神奇。为大中华,造新文学,此业吾曹欲让谁?”^②1917年年初,他在《新青年》2卷5号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成为了中国新文化运动最初“发难的信号”。胡适的自由主义政治、文化立

① 《康有为年谱》,《戊戌变法》(四),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14页。

② 胡适:《胡适留学日记》下册,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211页。

场,使他成为现代中国重“问题”不重“主义”的自由主义改良派的代表,在他身边也围绕着不少的追随者,以傅斯年、顾颉刚等最为著名。在学术上,胡适提出“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治学方针,对现代学术的发展起到了导引、示范作用。至于周氏兄弟,则分别是新文学的开山祖师和巨石重镇。鲁迅是一位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思想家、文学家、革命家,深得进步青年的爱戴,去世时获得了中国“民族魂”的盛誉,围绕他的鲁门弟子胡风、冯雪峰、萧军等人也都在现代文学画卷上涂下了浓重的色彩,做出了独特的贡献。周作人在“五四”时期也是新文化、新文学运动的重要人物,其《人的文学》成为新文学的纲领性文献,但“五四”之后的周作人做出了和鲁迅不同的选择,1922年,在“非基督教运动”高潮中,周作人和钱玄同、沈士远、沈兼士及马裕藻发表《信仰自由宣言》,重申信仰自由的精神,这标志着周作人在文化立场上开始向主张宽容的自由主义靠拢,他其后的散文创作也开始褪掉“五四”时期的“浮躁凌厉之气”,走向平和冲淡,苦涩闲适。在他身边,围绕着俞平伯、废名等著名作家,形成了现代文学史上一个独特的带有闲适、冲淡、唯美色彩的文学流派,具有其不可忽视的审美价值和意义。周作人又是中国民俗学、古希腊文学、明清文学的拓荒者和研究者,继承并发展其民俗学研究的弟子有江绍原,继承其明清文学研究的则有沈启无等。另一位国学大师钱穆也是现代文化史上极具代表性的人物,他生活的20世纪是中国文化上急剧“西进东退”的时代,但他逆时代潮流而行,秉持文化民族主义的立场,“一生为故国招魂”,为中国文化的传承、延续做出了重要贡献。他在抗战时期撰写的《国史大纲》,开篇即言“国人必对国史具有一种温情和敬意”,对其时代盛行的民族文化虚无主义进行了正面的交锋和批驳。他一生思考的中心问题是中国文化是否在现代还能占据一席之地的重大时代问题,他以其一生杰出的学术成就被尊为学界的“一代宗师”,也有学者称其为中国最后一位士大夫、国学宗师。他的弟子余英时、严耕望等也都成为在学术文化领域声名显赫的

学者。

古人讲：“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人们在选择老师、朋友时，会本能地倾向于选择那些和自己志趣相投、性情相近的人，师生关系也是如此。特别是私学传统中在师生双向选择下形成的师生关系，更是一种情同父子的关系，选择什么人为师，也就意味着对为师者的志向、人格、学问的整体性的尊崇和认同，所谓“一日为师，终生为父”。学生对老师有一种孺慕之情，而为师者对学生担负的是与父母一样甚至大于父母的责任，所以这种私学传统中的师生之间、同学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成为一种犹如家族血缘关系一样的文化群落。每个师徒群体自有其特质，成员的目标也基本相同，价值观比较相近，在思想行为上也表现出较强的一致性，成员对群体有强烈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这种师徒群体的存在除有利于他们戮力同心、共同担负起时代赋予他们的重大使命之外，还具有满足其群体成员的多种需要的功能，如使群体成员满足亲和与认同的需要，满足成就感和自尊心的需要并在此基础上产生自信心和力量感。学生为自己所属的师徒群体感到自豪，为师者对于学生也是关怀备至、提携扶持，不遗余力。像胡适的弟子罗尔纲专门写了一本书《师门辱教记》，十分动情地回忆了在胡适门下五年得到的言传身教。胡适对弟子的这本小书也十分看重，曾说此书带给他的光荣比他得到的35个名誉博士学位还要大。直到1958年，胡适在台湾任“中研院”院长时还自费印行了这个小册子，分赠亲朋。再如萧军直到晚年还骄傲地向世人宣称：“我是鲁迅的学生！”当别人问他20世纪30年代文坛宗派有哪些时，他的回答是：“别人有没有宗派我不知道，知道我也不说，但是我萧军有宗派——‘鲁宗鲁派’！”^①由此可见师生关系对于一个人的整个人生可能产生的深刻影响。这种知识群体中的师生关系一般情况下是亲密、融洽的，但师生之间也会出现齟齬，像梁启超与康有为在“张

① 秋石编著：《聚讼纷纭说萧军》，学林出版社1997年版，第64页。

勋复辟”立场上截然对立、公开辩难，梁启超情急之下直言其师乃“大言不惭之书生，于政局甘苦，毫无所知”。这使得一向刚愎自用的康有为大为光火，骂梁启超为“梁贼启超”，并将他比喻为专食父母的枭獍，并作诗曰：“鸱枭食母獍食父，刑天舞戚虎守关。逢蒙弯弓专射羿，坐看日落泪潸潸。”当然，两人多年的师生关系、患难之情并不会就此割舍，事过境迁后，仍会重修旧好，做学生的还是要向老师表示歉意和依顺。再如周作人1926年也因为不满于老师章太炎赞成“讨赤”，写了《“谢本师”》一文，表示不再认章太炎先生为师。这虽然从师生感情上来看不无遗憾之处，但也可从中看到现代个人独立意识对于传统单向服从性的师生关系的突破。与此相应的是为师者将学生革出师门的事也时有发生，像鲁迅之于高长虹、周作人之于沈启无等，其中的原因比较复杂，但这种现象本身也提示我们现代文坛上的作家多是以群体而非个体的方式参与文学活动的，发表作品的报纸、杂志多带有同人的性质，社会文化资源也多控制在名家之手。所以被革出师门的沈启无等于被驱逐出了文教界，一时间只能靠变卖东西为生；高长虹则因为受了鲁迅的迎头痛击，长期被视为文坛异类，声名狼藉。总之，以这种自然形成的知识群体为单位，从文化社会学等角度，深入分析近现代文学、文化的生产机制和文化生态，对我们深入了解近现代文学、文化也是大有裨益的。

本雅明曾经说过，“所有文明的文献都同时就是野蛮的文献”^①，也就是强调文明与野蛮的判断不能简单地以“时代”为标准，时间并不能将“野蛮”阻断于过去而在未来造出一个至善无恶的“美丽新世界”。章太炎早在清末就发表了他的《俱分进化论》，认为：“进化之所以为进化者，非由一方直进，而必由双方并进。……若以道德言，则善亦进化，恶亦进化；若以生计言，则乐亦进化，苦亦进化。双方并进，如影之随形……进化之实不可非，而

^① 转引自马丁·杰：《阿多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5页。

进化之用无所取。”^①故而至善无恶之境无从达致。历史乐观主义的虚妄在于其以对历史进步主义的信仰放过了对内在于人性深处的“恶”的警觉；以“新旧之别”“传统与现代的冲突”取代了“文明与野蛮”“善与恶”的价值判断。历史乐观主义所持有的线性不可逆的时间观及源于进化论的人性可臻无限进步论的信念构成了现代性的核心，也成为了中国现代文学、文化的主导叙事。对这种现代主导叙事的重新审视和反省也是我们今天更为深入地思考现代性问题的必要环节。我们力图走出那种特定的、单一的、目的性过强的、缺乏距离感的“第一人称叙事”，以一种更为客观、多元、审慎的态度来重审、讲述中国的“现代百年”，以加深对历史的认识以及对现实和未来的理解。

“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学术的进步依赖于一个可以商榷、辩难、交流对话的公共空间，因此“科学”意义上的真理不在于将某种特定时期的特定结论固化为绝对真理，而表现为不断地证伪与验错的过程，在假设与求证、质疑与抗辩中逐渐切近真实，将认识引向深入。从“20世纪文化大师与学术流派”入手研究近现代知识群体的形成及其对文化发展的影响，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本丛书的写作只是一个抛砖引玉的尝试，更为坚实的佳作尚有望于未来。

耿传明

2010年7月5日于天津

① 章太炎：《俱分进化论》，《民报》第七号，1906年9月。

目 录

引 言 说不尽的胡适/001

第一章 三地风雨人生路/011

一、从安徽到上海/012

二、留学美国 7 年/022

三、从新文化运动到执掌北大/027

四、台湾的最后 5 年/038

第二章 爱情与婚姻中的胡适/043

一、小心翼翼地去爱/044

二、收下一份“苦涩的礼物”/050

三、那段持续 50 年的跨国恋情/058

四、“醉过才知酒浓,爱过才知情重”/066

第三章 在文史哲领域开风气之先/075

一、他什么也没做好,却完成了一切/076

二、新文学革命的开拓者/081

三、“重述”与建构的新文学史观/092

四、问鼎上层文化的哲学史研究/104

第四章 现代学术思想方法的传承与启迪/119

一、从中国启蒙到美国师承/120

二、个性、思想与方法的实践/127

三、批评、反思与启迪/140

第五章 “红学界”的两个徒弟/149

一、俞平伯：“新红学”的真传人/150

二、周汝昌：“一个好徒弟”/175

第六章 史学研究领域的辐射/201

一、顾颉刚：“胡适是我的引路人”/202

二、傅斯年：敢骂老师的“诤友”/225

三、罗尔纲：“不苟且”的弟子/248

四、吴晗：实证史学的传承/274

第七章 “伯乐”之乐——胡适和其他弟子之关系/299

一、郭绍虞：发现“千里马”/300

二、苏雪林：追随老师一生的女弟子/308

三、唐德刚：民国口述历史的开拓者/315

四、自由主义之路：胡适与雷震、殷海光和李敖之关系/323

第八章 胡门弟子之间的恩怨纠葛/331

一、俞平伯与顾颉刚、傅斯年二人的友谊/332

二、顾颉刚与傅斯年的个人恩怨/340

三、俞平伯和周汝昌之间的齟齬和不快/348

结 语/356

后 记/363

引言

说不尽的胡适

海外为数不少的人以为,从古至今的中国文化史上只有两位名人,一位是孔子,一位是胡适。暂且不论这种说法是否科学,但它确实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胡适的影响之大,即便是鸿学硕儒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等人,恐怕也只能屈居其后。

从1917年倡导“文学革命”暴得大名,到1962年台湾岛归西,胡适的一生极具传奇色彩。有人说他“誉满天下,谤亦随之”,但誉也好,谤也罢,都从正反两方面证明他在现代中国社会的重要性。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胡适的著作开始重新成为一些史学研究者的学习读物,他的考证方法,在浮躁的学术界凸显出了独特的价值和意义。而对于那些学术圈外的人,他们也将胡适当作了自己学习的榜样,那是因为胡适高尚的人格、温和的态度、清廉的作风,以及不依附于任何党派与组织的独立立场,对他们都构成了极大的吸引力。作为中国现代史上最有风度也颇有争议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之一,胡适之所以在如今又浮出水面,并被推到历史前台,成为后学们的仿效对象,就在于他那独特的人格魅力与精神风范。他一生有过大胆的言说,也有过小心的妥协,有过不少的争议,也得到过许多认同,他在尽力帮衬他人,同时也被别人帮衬,这正是他在当时因为政治意识形态的原因遭到诟病和误读,而后

来又得以重新被发现和推崇的重要原因。

对于胡适的评价,很多学者总喜欢自觉或不自觉地将他与鲁迅及其他的现代知识分子进行比较,比较的结果,无非是春兰秋菊,各有千秋。李泽厚说:“胡适、陈独秀、鲁迅都开创了思想范式(Paradigm),从而都指导、决定和影响了很大一批人。胡适在学术领域内,陈独秀在革命领域内,鲁迅在文学领域内,都各有一大批思想和事业的承继者、追随者、景仰者。”^①以李泽厚的观点来看,胡适的身份首先是一个学者,他开创了中国现代学术的思想范式与方法革新之路。

的确,在中国现代学术谱系上,胡适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在文、史、哲等每一个领域的研究上,胡适都有自己的成就:他在青年时代就写出了《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虽然之后一直未能写出下卷;在红学研究上,他写出的具有开创性的《〈红楼梦〉考证》,启示了不少红学研究专家,包括他的弟子俞平伯和周汝昌;在史学上,他提出了“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重要治学观点,并一生恪守,身体力行。客观地说,胡适在每一个领域的专业性研究方面,成果并不十分突出,有时甚至还不如他的弟子;但值得钦敬的是他在每一个专业领域的研究,都具有开创性,都影响了学术界的研究者。这使得他在中国近现代文化史上价值独特,重要得无法忽视。

20世纪50年代中期,美国的《观察杂志》评选“当代一百名最有影响人物”,中国只有两人榜上有名,一位是教育家晏阳初,另一位就是胡适。胡适一生爱惜羽毛,操守端重,珍视名声,却淡泊利益,具有典型的儒家风范。在人格上,他也是经得起人们评说的,他出任驻美大使期间,有一笔高达6万美元的宣传费用他可以自己支配,但他却分文未动,后来如数退还给了政府;而在文史哲的创作和研究领域,他更是开风气之先,尝试写作新诗,提倡白话文

^① 李泽厚:《胡适、陈独秀、鲁迅——五四回想之三》,载《福建论坛》1987年第2期。

运动,对中国文化的贡献是多向度的。所以,美国的杂志对其做出如是评价:“他勇敢地推进了中国的白话文(一种为人们所不齿的口语)运动,他对中国的贡献可以与意大利的但丁和彼特拉克相媲美:他为数以百万计的中国人打开了文化教育的大门。而这些人过去是永远不可能掌握复杂的古汉语的……中国的学者鄙薄小说,而胡适从近两百年印刷质量低劣的白话小说中找出了数十部,发现这些作品完美、忠实地反映了中国的市井生活!它们不留斧凿痕迹,没有传统学者的酸气与迂腐。他重版了这些作品,并附以研究介绍——虽然市面上仅花几分钱即可购得廉价的版本,而这些价格昂贵的版本却被抢购一空。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连续两年名列中国畅销书之首。他用大众的语言创造了许多诗歌、戏剧、随笔。正是这次文学革命才推动了中国的‘平民教育’运动。”^①

留学归国后的胡适,是什么都想做,所以他涉猎广泛,在文史哲领域几乎无所不谈。本来胡适说他对政治不感兴趣,也决定不谈政治,但后来并未能遵守自己的诺言,还是因为一种责任、一份信念,若即若离地践行自己的自由主义政治观。最后,他却没能在政治上完全施展抱负,而又因之使投入学术研究的时间大大减少,无法彻底实现自己的学术理想。这是胡适本人的遗憾,也是中国学术界的一大损失:如果胡适能持之以恒地发挥自己的学术专长,去从事研究,想必他的学术之路将会是另一番景象。

因此,如果要问胡适一生最大的失误是什么,那可能就是 he 踏在“政治”与“学术”两只船中间,犹豫不决,而且在行动上还透出一种浓郁的书生意气。胡适曾有这样一个梦想将他潜意识深处的隐秘暴露无遗——“我梦想一个理想的牢狱,我在那里面受十年或十五年的监禁。在那里面,我不许见客,不许见亲属,只有星期日

^① 参见傅国涌《新语言和胡适的“得寸进寸”社会演进思路》,载台湾《思与言:人文与社会科学杂志》第47卷2期,2009年6月。